

教科書百年演進歷程與脈絡： 時代的軌跡

白亦方

國立東華大學
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教授
pai@mail.ndhu.edu.tw

楊智穎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教育學系副教授
jyh.yiing@msa.hinet.net

劉修豪

國立東華大學
國民教育研究所博士
hsiu_hao_liu@yahoo.com.tw

摘要

眾人對於教科書的立場總是存在著矛盾情結，一方面教科書只是學術的附屬品，缺乏原創性的貢獻；另一方面教科書宣稱某種知識有其特定地位，領導著課程與教學，因此教科書議題總是爭議不斷。本文希望經由觀察教科書演進歷程的社會脈絡，找出教科書足以發揮的功能，喚起大眾集體記憶和探究歷史角色地位的價值，以增加對教科書發展、選用及使用之複雜互動的理解。基於此，本文採透過歷史研究及文獻分析，有系統地蒐集一手及二手資料，在時間序上，主要以不同文化反映出每一時期教科書的歷史刻痕；在空間上，從血脈共流的中國大陸到以台灣為主體的政治體系。綜合歸納：1.各時期教科書皆有其特質，在適當的時空下可推行順利，但時過境遷，卻又窒礙難行；2.教科書的內容、形式，勝於興趣、學習的價值；3.教科書的殖民印象，反映出長期象徵性資本的累積；4.教科書的掌控及鬆綁，是長期的教育競技場等啟示，作為歷史的借鏡。本文研究的價值，就社會意義而言，在於使社會大眾瞭解每一文化背景下的社會規範，期能調整對教科書的刻板印象；就教育意義而言，可提供文化傳統選擇的借鏡，實現教育目標所應完成的基本任務；就學術意義而言，可讓有志者洞察教科書歷史的重要線索，形塑政治社會與教育專業的論述空間。

關鍵字 教科書歷史、教科書研究、台灣社會脈絡

壹、前言

教科書是政治、文化的產物，也是經濟商品；它同時具有文化、社會、政治及教育等面貌。以功能來說，教科書是文化精華的傳承媒介、促進社會團結認同的利器，又是維持階級利益的工具，更是師生教與學的溝通橋樑（王麗雲、甄曉蘭, 2009: 3）。儘管它的形貌涵蓋了文學類型（literary genre）、文化客體（culture object）或者學習載具（learning device），舉凡所有編輯體例、教學形態、文化脈絡、歷史事實、以及各方期待的任務事項（agenda），全歸屬在一個包羅萬象的「教科書」一詞當中（Issitt, 2004: 684）。因此，學術界輕視教科書，認為它只是學術的附屬品，缺乏原創性的貢獻，無助於學術的發展（Boostrom, 2001: 229）。當前的社會對於教科書有著極度負面的看法，甚至出現根深蒂固的反教科書（anti-textbook）現象。因為教科書成為各方利益團體的爭論焦點，導致教科書總是「提到的事物很多，但卻很少具體地深入討論。」教科書一直想成為所有人的切身事物，但最終無法取悅任何人（Rossmiller, 1992: 3）。

另一方面，我們不得不認同教科書的特定地位。因為教科書宣稱：「這是某種知識，這是你需要的知識」（Rossmiller, 1992: 44）；同時教科書也告訴兒童教科書是：「年長的一輩期望他們必須知道的事」（Crawford, 2003: 6）。教科書如同一種保證，成人想要確定孩子擁有教科書，即是保證擁有知識、看見未來。這樣一來，教室中絕大部分的活動都與教科書有關，中小學學生其75%的課堂時間、90%的作業時間，都耗在教科書上（Apple, 1998: 159）。依據Komoski（1985: 31）研究指出，教科書儼然已形成自己的帝國；98%的課程內容出現在教科書當中，只有2%的課程內容由教師獨力完成，這些統計數據確立了教材驅動（text-driven）或教材本位（text-based）的課程。對於這種情形，Apple（1986）的回應是：「我們確實有國定課程，但它既不是由民主選舉決定的，也不是由教育單位決定的，它是由教科書決定的。」「在中小學課程及教科書中存在著一個標準，即是不可丟棄任何東西，只要增加就好。」不管我們喜歡與否，教科書已在市場上到處兜售，它們不只是教科書，更是商品，一種存在於競爭市場上的商品（引自Rossmiller, 1992: 5）。

基於前述，社會大眾對教科書的立場存在著矛盾情結，有關教科書的議題總是爭議不斷。從教科書與課程/教學如此緊密的關係來看，反映出精粹主義者對教師的不信任感，視教科書為唯一的教材；因為人們害怕改變，期望能夠傳授下一代這些曾經在學校學習過的教材，或是自身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對於反對教科書的心結來看，則反映出進步主義者對政府政策的不信任感；雖然教科書紀錄了社會文化變遷及教育政策的發展，但仍遭受質疑：這些知識是真實的嗎？這些是我的知識嗎？此涉及了意識形態的膠著。產生這些矛盾的原因，在於學習者與教師、學習者與教科書編撰者、學習者與知

識結構、學習者與社會權力的特殊關係，形構了教科書中蘊含的各種大小不一之勢力，諸如主流團體的理念、當代的社會價值、出版工業的商業動力、特定領域的學科地位及先進的科技媒體。因此，教科書的研究有其重要價值。

早在1979年，盤治郎的碩士論文即以中國小學語文教科書作為內容分析的對象，堪稱為我國最早的教科書研究（周珮儀，2003: 12）。迄今，相關的教科書研究，仍以內容分析、編審制度或選用等議題為主，較少以歷史角度探討教科書政策形塑或實施的議題（王麗雲、甄曉蘭，2009: 4）。周珮儀及鄭明長（2008: 194-197）也指出，教科書研究雖然已從數量增加往品質提升進展，但是研究往往趨易避難，研究者選擇容易進行的量化內容分析或問卷調查，獨特的創見與貢獻似乎不足。多數研究把教科書當成靜態產品進行量化的內容分析，無法告知我們教科書發展歷程的微妙關係及利益糾葛，或教學實務中如何解讀或運用教科書等詳細的答案。因此，運用俗民誌、教育批評、結構分析、論述分析等方法，將有助於闡述教科書形成與互動過程的複雜特質，或表面意義下的深層結構及背後脈絡。這些方法值得期待。

Watt（2007: 5）認為，教科書始終保持著隱密、不可接近的特色，因為教科書研究總是頌揚讚美，甚少事實及軼事的敘說。這些研究出自於對教科書出版的歌功頌德，避開了教科書的政治衝突原貌，反映的多是合群、共識及理性討論，而政府當局總是開放、有擔當，未曾有過惡意。Jean（1978: 43）則主張應客觀地揭露教科書出版過程的歷史脈絡，並加以評論。本文認同教科書扮演歷史中特殊參與者的觀念（石玉、葛越，2010），尤其研究教科書歷史，可以生動地還原教育現場、記錄教育制度、詮釋教育思想，也可以洞悉每一事件的人、事、物（石鷗，2007: 8）。因為，教科書承載了社會文化發展中的豐富訊息，每本教科書編撰必然蘊含著當時的教育思想、主流理念及文化。因此，時逢我國建國百年，敘說教科書百年演進歷程，正可見證社會政治、文化、經濟的起伏變化。基於此，本文撰寫的目的，不僅在於對教科書本身的興趣，更希望在觀察社會脈絡的過程中，尋找教科書足以發揮的功能；喚起大眾的集體記憶，探究歷史角色地位的價值，以深化對教科書發展、選用及使用之複雜互動的理解。

貳、教科書百年歷史的軌跡

學界有關教科書演進歷程的研究，曾經零星出現；諸如《教育與國家發展——台灣經驗》（羊憶蓉，1994）、《中國近代教科書發展研究》（王建軍，1996）、《小學教科書發展史》（司琦，2005）及《百年中國教科書圖說（1897-1949）、（1949-2009）》（石鷗，2009）等著作。從這些著作的段落文字中，很難想像看似平凡、單調的教科書，竟然深藏著如此紛繁、厚實而生動的歷史。司琦以小學教科書為文獻蒐錄範

圍，仔細地將每一時期的發展，忠實紀錄其歷史刻痕。雖然石鷗的著作尚未目睹，但透過一些文獻評論，可瞭解其蒐錄範圍之廣（教科書多達5千餘本），堪稱巨作（吳小鷗、周英杰，2010）。不過，對於教科書的評論，應以王建軍的描述最為深入；其清晰交代清末民初時期的社會脈絡及教科書的代表意義。至於羊憶蓉的研究，剛好填補了戰後政府遷台的社會變遷與教科書演進；她以40年代到70年代的教科書為內容分析對象，此對台灣有著重大意義，也彌補了前述著作的不足之處。

在這些歷史的探究中，我國教科書的面貌從最初的啟蒙經典到因應實際的需要；從翻譯外國著作到自編教材；從封建、倫常、道德到科學、兒童、愛國的主要內容；從文言文到白話文；從沒有標點符號、插圖到精美封面、圖片；從不分學科到單學科的完整知識體系；從審訂到統編再到開放的制度；從中國儒家文化到台灣在地文化的意識形態等，可以瞭解教科書的發展與社會變遷的互動關係。然而，本文撰寫教科書的演進歷程，重點並非教科書實體的描述，或以事件、制度做為區隔教科書發展的時間脈絡，而是以教科書對傳統文化的再現與加工、對外來文化的接納與排除等現象，作為參考依據。在時間序上，聚焦在不同文化反映出每一時期教科書的歷史刻痕；在空間上，則涵納從血脈共流的中國大陸到台灣的政治體系。

一、西方文化的啟蒙期

1842年，清政府歷經鴉片戰爭慘敗，大批外國傳教士進入中國，東西文化產生觸碰，同時也將教科書¹的概念引進中國。當時西學傳入，孕育了中國教科書的發展。洋務學堂（新式學堂）陸續出現，解決了當時追求西方文化的渴望，而翻譯工作勢所難免，其中同文館譯印西洋圖書即是一例。這些西書內容多半屬於零散的科學技能或知識，編排也較粗淺，無法呈現有系統的完整知識。直至1877年，在華的美國基督長老教會傳教士Calvin Wilson Mateer指出：「教會學校的成敗，相當程度上取決於是否擁有好、合適的教科書。」於是教會成立「學校與教科書系列委員會」（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負責籌備一套初等學校課本，此不僅提供教會學校使用，也讓非教會學校的學生使用。中國近代第一個編輯出版的教科書專門機構於焉正式誕生，也標誌著中國近代教科書的產生（謝毓洁，2010: 105）。不過王建軍（1996: 3）認為這僅止於歷史的界定，並不代表中國近代教科書發源於此，而是因為如果沒有西方教科書的傳入、沒有對外開放的環境，就沒有中國教科書的近代化。

僅僅翻譯西書無法滿足當時對於西學的熱情，於是中國掀起自編教科書的熱潮。

¹ 1834年，Truman and Smith鼓勵一位傳教士及教師William H. McGuffey，在牛津大學寫了一系列大四的年級讀本，並成立美國圖書公司，當時成為全美的獨佔企業（Watt, 2007: 4）。

1897年，南洋工學成立，師範生陳懋治等人自編三冊《蒙學課本》，是我國近代自編教科書的濫觴（國立編譯館中小學教科用書編輯研究小組，1988: 9）。該教科書不同於傳統的啟蒙讀物（如三字經、百家姓等），而比較接近日常生活，以實用為主，編排體例具有時代的特色。民間自編版以商務印書館印行的《最新國文教科書》最具有歷史意義，在教科書發展過程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為它具有分科的概念，依照學制規程編輯，在巨大的教科書市場中可謂異軍突起。該書從1904年一直發行到1911年，發行量佔全國課本的80%。蔣廣學（2010: 86）分析其成功原因為：1.積極爭取清學部的支持；2.不斷提高銷售人員的素質；3.盡力舉辦教育事業；4.廣設發行所。可見當時的教科書市場競爭十分激烈，稍後崛起的中國圖書公司也曾以咄咄逼人的聲勢後來居上。在清末短短十幾年間，參與教科書的團體難以統計，以1906年上海為例，參與書業商會的會員共有22家（華苑，2006: 95）。

除了來自民間的力量，官方也是影響因素之一。根據清政府「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方針，應以編輯中國經史之學為依歸。在封建時代，即使是啟蒙教育的識字教材，也必須得到統治者的默認才能流行于世。在東西文化衝突碰撞之後，新舊教育交替，為中國的文化選擇，帶來諸多的矛盾與困惑，此時教科書審定制度的問題便凸顯出來（王建軍，1996: 145）。1902年，清政府廢止八股，設立「京師大學堂編書處」（隸屬當時的中央教育行政機關），但未見任何教科書出版；當局旋於1904年廢除大學堂編書處，同時頒訂《奏定學堂章程》，確立了教科書審定制度。1906年設立「編譯圖書局」，專門負責編撰及審訂學堂的教科書，出版了《初小國文教科書第1冊》，開創了統編本教科書之先驅（吳小鷗，2007: 21）。

做為當時的統治者來說，新式教育興起後的實際問題在於缺乏認識、考慮不週，更何況教科書編寫常被認為微不足道，使得後來教科書問題變得十分棘手（王建軍，1996: 159）。為了使教科書的編寫既快又好，並能廣博而得要，清政府允許私人編撰，可見其出於政府的一種權宜之計。1904年，中華教育界發表《現行教科書制度與前清之比較》，奠定日後中小學教科書採行審定制的基礎（國立編譯館中小學教科用書編輯研究小組，1988: 14）。在新舊教育交替之際，政府實施審定制是為了有效控制教科書的發展，進而有效控制新式學堂的發展。這一制度的確立，正式宣告有目的、有計畫、有組織地編審教科書的開始，肯定了新式教科書存在的合理性，也肯定了民間編寫教科書的合理性（王建軍，1996: 163）。

這段時期的教科書，從學塾的傳統讀物逐漸演進到有標點、插圖的革新教材，以及分科、單元化的教科書。舉凡同文館譯印西洋圖書、基督教會編譯傳統課本、新教育制度的建立、大學堂統編中小學教科書及學部頒行《第一次審訂初等小學教科書凡例》等事件，有助於此時期教科書的發展（司琦，2005: 29581-29621）。謝毓潔（2010: 109）

認為，晚清新式教科書的價值，在於教科書既是中國教育近代化的需求，也推動了中國教育的近代化，確立了科學理性的態度；依據現代學科分類，促成民間教科書出版業的迅速崛起。

二、新文化的激盪期

1911年，民國政府正式建立，同年召開「臨時教育會議」，改定學制，從此學堂改稱為學校（司琦，2005: 29671）。新教育初期，教科書全為文言文，為了變法圖強，吸收西方文化，新中國的成立不再強調革命精神，而是養成完全的人格；此意味著提升國民素質，藉以加強國力。此「完全的人格」，依據王建軍（1996: 195）的見解，應是具有自主權力的國民，不再受到封建時期的規訓。新政府重新思考新教育的本質，普遍接受杜威實用主義的教育思潮，強調兒童本位的教科書編寫原則，並認為清末政府的教科書仍只是新瓶裝舊酒的改革，而當時美國諸多教育學者來華講學，如：Paul Monore, John Dewey, W. A. Call, Helen Parkhurst, William Heard Kilpatrick等人，有助於此時期教科書的發展（司琦，2005: 29741）。

建國初期，政治的黑暗混亂令人失望，改革方向迅速從政治轉入思想文化。一些有識之士，如陳獨秀、胡適、魯迅、梁啟超及蔡元培等人，接受了西方文化的薰陶，體認當代中國應以科學與民主為主，掀起了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毛帥，2008: 121）。其中蔡元培對當時教科書發展扮演舉足輕重的作用。1902年，蔡元培等人在上海倡立「中國教育學會」並任會長，同時兼任商務印書館編輯所所長；其指導編輯教科書，力求發展具有新時代、新特點、新方法的現代教科書。他認為當前學界最缺乏者為教科書。1904年，第一套具現代意義的《最新教科書》問世，因此蔡元培可說是現代教科書的倡導者與參與者。而所謂「現代」教科書的意義，即是滿足以下條件：1. 依據現代學制編寫而成。2. 與教授用書、教學參考書配套。3. 依教學計畫規定學科分門別類編寫、出版（石鷗、張斯妮，2009: 5）。1911年，商務印書館順應時勢，編輯《共和國小學教科書》，倡行全國，創下審定版教科書的盛況；同年教育部公布《審定教科用圖書規程》（國立編譯館中小學教科用書編輯研究小組，1988: 20）。

1912年，蔡元培被任命為首任教育總長。他首先禁用清學部頒行的教科書，並頒布「普通教育暫行課程標準」，明確規定各種教科書務求合乎共和國宗旨，確立了民主共和教科書發展的指導思想。他尤其推動語體文（白話文）教科書，解決言文體例不一致的問題。同年中華書局推出《中華教科書》，以獨立、自尊、自由、平等之精神，期望養成完全共和國民，以厚植國家基礎。其中，國語教科書的編撰最能體現該時期教科書的特徵。其受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採取白話文（周其厚、荊世杰，2007: 106），直至1920年教育部下令將國文改為國語，小學教科書一律改為語體文編輯（國立

編譯館中小學教科用書編輯研究小組，1988: 26)。此外，蔡元培更是教科書中文化的實踐者。1931年，蔡元培在上海的演講中提到「國化教科書」，提倡以中文撰寫本國各級學校教科書（范軍，2010: 9）。

民初的教科書在此背景下逐步成熟，但也並非諸事順遂；除五四運動的影響外，尚有傳統復古主義與新文化的競爭。1912年袁世凱復辟，實行獨裁統治，直接波及教科書編寫，輒以尊孔尚孟、傳統固有文化為基礎，完全否定了南京臨時政府的教育宗旨。在所頒《特定教育綱要》中，要求教科書：一是讀經，一是將孔孟學說貫穿於教科書中，此一事件引起了新舊文化的衝突（王建軍，1996: 195）。當時坊間仍有零星的文言文教科書供少數保守派私用，不過終究力量薄弱，幾乎絕跡（吳研因，1936, 01.30）。由此可以觀察到，教科書體例形式的問題代表政府對教科書的思考已深入到較為實質性的局面（石鷗、張斯妮，2009: 8），而民初人們對教科書的思考，已漸趨於自覺與理性（王建軍，1996: 220）。

三、殖民文化的侵略期

1895-1945此50年間，日本兩度發動大規模侵華戰爭；伴隨著軍事佔領、政治統治及經濟掠奪戰略，其透過教育對中國人民進行民族意識的奴役與壓迫。因此，日本侵華期間推行的殖民文化，自然成為我國教科書發展的一部分。1895年，清政府甲午戰爭失敗，被迫與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馬關條約，割讓台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各島嶼、澎湖列島和遼東半島給日本。同年總督府下設學務部，掌管相關教育之事務；於是日本一接手台灣的同時，即實施殖民教育。1898年公布《台灣公學校令》，明訂公學校教科書需經總督府檢定許可，唯實際上則是學務部編輯、總督府發行。1919年《台灣教育令》頒布，對象為學生以台灣本島學童為主的公學校（前身為國語傳習所），致力於國語（日本語）的教學；教授的科目則為國語、讀書、作文、習字、算術等，並以「尊皇室、愛本國、重人倫、養成本國精神與啟發智能」為主（台灣教育會，1995）。殖民方針決定了殖民地的教育政策，而當時學務部長伊澤修二即建議應設立師範學校，並進一步編輯教科書（吳文星，1982）。此時期教科書內容除了傳遞帝國主義意識形態，尤重實學教育—亦即實用知識與技能。另一方面，日本有鑑於台灣勞力的驚人力量，因此也注重國民的身心發展。

1937年，日本正式加入二次大戰，台灣也進入戰時體制；日本政府對台灣灌輸戰時體制意識形態的意圖，更加充分反映在教科書上。日本在台灣厲行皇民化教育，將初等教育分設為小學校、公學校、教育所三種；小學校幾全為日人子弟，公學校多為台灣兒童，教育所則純為原住民兒童設立。1940年《國民學校令》公布；1941年，小學校及公學校歸併為國民學校，實施的教材也有第一、二、三號課程之分，明顯歧視台籍平地及

原住民兒童（司琦，2005: 2223）。當時教育改革的目標即在培養真正的皇國民。台灣第一套國語教科書《國語讀本》，最具深厚的殖民色彩（陳虹文，2001: 88）。黃英哲（2006: 107）描述當時臺灣學生的心情：「【我們】已經體認到自己和日本文化是切割不斷的；雖然誰也沒講絕，卻可以感覺得出【我們】甚至已經把日本當作自己的故鄉。」此反映出殖民文化對台灣學生影響至深。

台灣總督府所編纂的公學校教科書，曾經數次改版發行。最早編纂的是「國語」和「修身」兩科。其中「國語」科第一套教科書於1901年首先出版，隨後1910年發行「修身」科教科書。日治五十年期間，「國語」和「修身」都歷經五次修訂。此外，國史(日本歷史)和地理於1920年代開始編纂，並修訂兩次。國語、修身、國史和地理教科書，都由官方規定和統一編訂，因此備受重視。每次修訂的版本都反映出政治意識、教育思潮和時代的變遷及需求。當時也有一些鄉土題材（如公學校的唱歌教科書），對臺灣兒童有其正面意義，也是國定唱歌教科書所沒有的（賴美鈴，2000: 5）；但是那些教材也可視為政治手段，因為這些題材所呈現的臺灣，跟《國語讀本》所述者相同：「國語讀本中所呈現的臺灣是缺乏歷史的臺灣，也就是只描寫『眼前』的臺灣，至於把臺灣帶到『眼前』這個時間點的『過去』，卻避而不談。」（周婉窈，1999: 7）

大陸方面，1931年，日本在上海發動九一八事變，隨即於次年發動一二八事變，擴大對華侵略；其中摧毀商務印書館總部，正是日軍運用軍事手段進行文化侵略的典例，也對我國文化出版事業造成重大損失。八年抗戰期間，商務印書館34處分館損失慘重，但仍執國內出版業牛耳，為抗戰事業盡心盡力。其餘國內四大出版業的中華書局、世界書局、大東書局與開明書局，也將重心轉移至重慶或香港。1942年，日方曾查扣大量書籍及印刷設備，經偽政府斡旋之後同意歸還，但前提是必須出版汪精衛偽政府的國定本教科書（郭太風，2004: 36）。教科書的政治特性畢露無遺。

抗戰時期，教科書可說是在苦難中編印（紙張及印刷問題），但也成為控制中小學教科書出版與推行黨化教育的合理依據。1931年，教育部設「國立編譯館」，掌管審查中小學教育圖書事宜（賀金林，2006: 45）。1938年因應戰時需要，通過《戰時各級教育實施方案綱要》，成立各級學校各科教材編定委員會，修訂小學課程標準（司琦，2005: 29801）；其將小學高年級公民、歷史、地理三教材，合編為社會課本。教科書的改編專為適應抗戰時期之需要，以補充當時各種教科書之不足（中央日報，1938. 06. 30）。此時期教科書體例由記敘文體改為說明文體，呈現多種版本（戰時版、大陸版及台灣版），屬於故事（兒童）中心式的新教材（司琦，2005: 2941-2947）。當時政府發奮圖強，抵抗日本侵略，著手編撰黨化教育課本《前期小學三民主義教科書》。文化建設協會南京分會也舉辦徵求小學教科書評論（中央日報，1935. 06. 06），鼓勵檢舉敵偽教科書（中央日報，1947. 10. 08）。此時期教科書採行公編私印辦法，部編本教科書發行權

交給正中、商務、中華、世界、大東、開明、文通等七家書局聯合組成之國定中小學教科書聯合供應處印行；至此宣告進入國定、審定並行制度。但由於諸多弊端，旋於1947年開放部編教科書的版權（中央日報，1946. 04. 01）。外來文化的侵略，意外地奠定了教科書特有的地位。

四、儒家文化的再現期

台灣經歷五十年的殖民統治之後，社會正面臨語言文字轉換、經濟變動與意識形態的灌輸。當時本省族群與外省族群並無共通語言，所有語言都是台語（包含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語）及日語（當時稱國語）。多數的本省族群無法讀漢文，也不能通北京話，因此戰後初期的台灣掀起學習國語的潮流，也造成可讀的日文書籍越來越少；市面販售的中文圖書水漲船高，不但為數極少，且價格昂貴、過於艱深（劉性仁，2008: 56）。又因為遷台之初，物質缺乏、經濟蕭條，人民生活艱苦；印刷及造紙工業衰退，造成出版環境的困難（蔡盛琦，2009: 68）。雖然這些殖民統治結束的種種紛擾，是政府亟應解決的問題（黃英哲，2006: 107），但對政府而言，接收臺灣後當務之急是，如何儘速使臺灣「去日本化」與「再中國化」。

1945年，政府派陳儀接收臺灣，任命其為戰後登台統治機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以下簡稱長官公署）——行政長官。陳儀抵臺後，立即展開「去日本化」、「再中國化」之文化重建政策。當局為加速台灣與內地學生程度趨於一致，廢止原訂暫行教學科目表，改用部頒課程標準，供應全部教科書（司琦，2005: 2223）。長官公署教育處（後改為教育廳）設立「台灣省中等國民學校教材編輯委員會」負責編輯國民學校教材；該委員會之後於1946年擴編為「台灣省編譯館」，屬於執行文化重建政策之機構，設有學校教材組、社會讀物組、名著編譯組和臺灣研究組；另設立台灣書店，共同負責辦理教科書的編印工作。其中學校教材組的任務是，編輯適合臺灣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及師範教育學生中文程度的教科書，以推展中國語文教育，並透過內容灌輸中華民族意識。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後，行政院會決定裁廢長官公署，改組為省政府；同時徹廢編譯館，其業務則由省政府教育廳接管（黃英哲，2006: 116）。至1953年，小學教科書的編輯工作復歸於國立編譯館，負責國語、算術、社會、自然等科；勞作、美術、音樂仍由教育廳編印（國立編譯館中小學教科用書編輯研究小組，1988: 44）。

許多台灣人民對於能夠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回歸祖國懷抱，抱著極大熱忱與期望。因此，各級學校教科書乃以大中國的史觀呈現台灣歷史，並積極實施反共教育。單就1946年觀之，官方與民間合計發行22種學生課本—尤以國語科多達10種，數量上呈增加之勢。行政長官公署推動的中國化政策，清楚反映出教科書的發行（何力友，2006: 17）。此種現象說明了早期台灣社會結構簡單、經濟困頓、外來文化刺激又甚為薄弱的

狀況，政治力幾乎主導了整個經濟發展以及社會意識型態的基調（陳文彥，2010: 131）。在中國民族主義意識籠罩的氛圍下，讓學生了解中國文化與歷史，實與現實社會、政治情勢有關（王甫昌，2001: 159）。1948年政府制定《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1949年實施《戒嚴令》，為強人領導提供穩固的法令基礎。其次，國際政治環境，也促使大中國歷史觀點因為外部國際政治需求，在台灣內部取得難以撼動的合法地位。國民政府在美國的支持下，與中共爭取合法的中國代表地位，國際上邦交國家數量仍比中共更多；在此情況下，政府宣稱的正統中國代表合法性，幾乎沒有受到任何內部的質疑（王甫昌，2001: 163）。

1950年，韓戰爆發，美國基於戰略考量轉而支持在台的國民黨政府；台灣因韓戰正式成為冷戰體制下西方陣營的一環，有助於威權統治體制的確立（彭雪玉，2006: 195），此也導致教科書內容環繞反共抗俄的特質至為明顯（司琦，2005: 2224）。不過，教科書的粗糙品質仍未改善，反映了當時台灣經濟百廢待興的景況（羊憶蓉，1994: 262）。當時許多議員曾經在議會中公開發批評教科書為「天下第一書」，印刷壞第一，內容枯燥無趣第一，插圖少第一，而且字體小第一，非改編不可。書局也為了市場考量，逐年將審定的教科書翻版²（聯合報，1955. 09. 20）。因此，教育部著手收集各國的小學課本，邀請教育專家從事教科書改編工作（聯合報，1955. 04. 04）。

政府透過教科書傳遞大量的中國固有儒家價值觀念，從教科書內容來看，研究指出，不論國中或高中教科書，表達傳統價值的出現次數皆高於現代價值，且出現最多的分別為「孝順、友愛、忠勇」（國中階段），及「忠勇、博愛、家族觀念」（高中階段）；教科書所追求的社會秩序和迴避動亂取向，確實為當時剛因國共失利來台的國民黨政府所急需（黃俊傑，2006: 20）。1966年，政府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以回應中國大陸的文化大革命，而推行國語運動相對的壓縮了本土語言的空間，其本質上政治意義大於文化意義（彭雪玉，2006: 204）。1967年，幾家書商配合該項活動，成立「教科書出版事業協會」，達成傾全力推行復興中華文化之決議（中央日報，1969. 01. 21）。此時期，全台灣所有的中小學都一體採用國立編譯館出版的教科書，因此教科書所傳播的儒家價值規範內容，具有高度的同質性。依據羊憶蓉（1994: 311）的分析，這個階段的教科書具有強烈的傳統取向，意即傳統中國所強調的重要價值觀，也反映出課程目標的制定，多是基於政治考量。教育部也特別指示教科書指導委員會，教科書的修訂及新編，尤重加強民族精神、倫理道德及文化陶冶。

² 同樣的內容，偏偏在目次編排上下工夫，有編提前，有編移後，有些「之」字改為「的」字，有的將「吾」字改成「我」字。這些沒有新奇的教科書，卻硬要挖去家長們的腰包，使子女眾多的家長無法「克難」一下，利用舊書（聯合報，1955, 09.20）。

五、在地文化的覺醒期

經過上述動盪，台灣社會逐漸安定，國民所得提高，就業機會增加。此時社會需要較高知識或技能的人力，因而國民學校競作升學補習。為減緩此現象，政府於1968年採取延長國教政策，以消除惡性的升學瓶頸現象，同時有助於培養知禮守法的公民，提高行使公民權利與義務的素質（司琦，2005: 2548）。正當社會內部趨於穩定成長，台灣卻在1966年退出聯合國；1971及1972兩年中，即有26個國家與台灣斷交。1971年後，國際正式承認中共的國家地位，1972年中日斷交、1979年中美斷交，台灣在此一連串外交挫敗衝擊下，國內外情勢逆轉；本省族群有了新的發展機會，內部也出現一些政制改革及民主訴求，台灣意識逐漸萌芽。

1987年，政府宣布解嚴，基於人道考量，開放台灣地區民眾赴大陸探親，從此兩岸交流，台灣的政權地位丕變，也連帶修正動員戡亂時期教科書，以適應海峽兩岸交流互惠的新情勢。蔣經國去世之後，李登輝繼任，並於1990年當選第一任民選總統。此時期經濟起飛，新中產階級及外省第二代開始關心一些嚴重問題，如生態、環境汙染、不平等對待等。新勢力開始要求政府著手解決，迫使政府關注人民的需求及權利，權力核心漸漸本土化（王甫昌，2001: 174）。台灣意識崛起，中小學教科書的大中國意識也開始受到公開而有系統的質疑。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教育部不可避免受到有關台灣課程的壓力影響，1990年開始進行中小學教科書修改工作（司琦，2005: 2548）。

1992年至1993年期間，「台灣教授協會」完成體檢國小教科書的工作。吳密察在序言中提到：「不敢相信每個台灣人在生命的啟蒙階段，在很小的記憶裡就要在教科書／現實之間做時空跳躍。這般翻閱國小教科書的心情就像教科書對小學生一樣的複雜」（吳密察，江文瑜，1994: 3）。體檢的結果發現，國小教科書已成為當權者傳遞其統治意識形態的主要工具³。羊憶蓉（1994: 241）也認為，教科書所出現的典範人物以中古代人物居多，相對於台灣主題略為輕忽。1993年，教育部以《認識台灣》此一新科目（包含歷史篇、地理篇及社會篇）取代原有國中一年級的歷史、地理及公民科目，經立法委員關注，呼籲教育部暫實施，並邀集學者召開公聽會，因而引發各方一連串的反應（陳希林，1997）。該套教材反映出反中、親日及反李登輝歷史內容的爭議（王甫昌，2001: 147）。台灣社會首次產生教科書內容引發爭議⁴與普遍討論的現象。

³ 「……仔細分析內容，可以粗略以階級劃分來做一總結，此處的階級包含了國家對人民、強勢族群對弱勢族群、男性對女性等；從國家意識上來看，是人民對國家（黨）的服從關係。從族群意識來看，是宣揚霸權主義至上的理念。從性別意識看，是父權社會的傳統刻板劃分」（吳密察、江文瑜，1994: 4）。

⁴ 國中「認識台灣」的教科書，從一開始就引來統獨人士批評其「認識不夠」或「認識偏差」；由新黨立委主導的「蛋洗」教育部抗議活動，把這場「認識台灣」的爭議更加白熱化。民進黨甚至公開向幾位領頭抗議者下辯論戰帖（聯合晚報，1997. 07. 13）。

從台灣政治社會的變遷過程來看，「認識台灣」教科書的出現，可說有其必然性。台灣畢竟有著複雜的歷史、政治環境，過去威權年代的意識形態影響仍舊存在。既往異族殖民統治仍有深刻烙印，不同年代移民的認同感存有落差，族群間的政經處境和發展際遇多所不同；加上當前臺灣人民對中國的恐懼與不安全感，部分即源自於長期反共教育所形塑的認知框架與集體心態（王恩美，2010: 52）。種種不容否認的事實，造成大眾對歷史的解釋各有強烈反應，以便能為自己的安身立命，找到認同憑依。多位學者在台灣光復五十二周年紀念日座談會中指陳：「該教科書未獨立超然於政府運作和政治主張，仍陷入意識型態的困境中而未恢復教育的本意，令人遺憾」。國民政府遷台後，沒有台灣史或台灣意識的教科書，可說是政策問題，雖然「認識台灣」試圖填補這段不容遺忘的空白，但此「去中國」意識教科書想要讓台灣走上國際舞台的手段，其實也暴露了思惟上的泛政治化（楊蕙菁、廖敏如，1997）。

解嚴後，鬆綁了政治對社會力的禁錮，政府對人民意識型態的控制力大為降低，原先單一的聲音亦日趨豐富多元。在經濟與社會方面，台灣經濟逐漸發展、人民教育水準提升，使得中產階級人數增加，成為支持教育的背後力量。而當時李登輝接任，取得相當好的政治機會順勢開展（陳文彥，2010: 137）。李登輝對教育的態度是：「我們認為要讓學生成為教育的『發現之旅』，首先必須改變從戒嚴時期沿襲至今、從未真正變革的黨國意識形態內容及其遠離台灣現實的心態，全面徹底翻新現行中小學課程，排除大中國意識」，而要達到此一理想，應對中小學課程標準委員會重新全面改組，才能促進台灣主體的課程（台灣日報，1995. 02. 14）。1994年，包括「教師人權促進會」、「振鐸學會」、「人本教育基金會」，以及「主婦聯盟」等團體發動410教改聯盟大遊行；同年促成「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諮詢委員會」的設立，社會運動促成教育權力結構改革的鬆綁。依據政大選舉研究中心調查顯示，台灣民眾之認同台灣人的程度遠高於中國人，顯示台灣意識已漸漸增長（劉性仁，2008: 58）。

儘管一般人認為解嚴即代表台灣已經民主化，但是事實上，如周陽山（1990: 146）指出，政治自由化與民主化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前者的核心概念是公民自由（civil liberties）如言論自由權等，而後者則是政治權利（political rights），如參選與選舉權，一個自由的社會不見得就是民主的社會。由此，雖然諸多體制開放，但論述空間仍然有限，尤其教科書取材欲呈現台灣主體性仍是相當艱難；因為立法機構中的舊力量佔絕大優勢，教科書審查的重點仍停留在是否有違黨國思想與民族精神教育的最高指導原則（莊萬壽、林淑慧，2003: 44）。其次，教科書也受制於使用者-教師-的習性，書商若增刪某些新內容或大量引用白話文，將削減市場的競爭力。不過整體而言，解嚴孕育台灣民眾更多的民主思想，讓國民勇於辯論國家政策——包含教育在內，此點不容否認（趙永茂，1996: 42）。

六、多元文化的競爭期

台灣多元文化主義隨著政治、社會、文化、經濟等現實的變遷，逐漸發展成為台灣政策發展的重要論述之一，也型塑了台灣社會的政治想像，聚焦在女性主義／女權運動、原住民權益、國族主義運動／國家認同政治以及外籍勞工與配偶／新移民的權利等議題上（魏玫娟，2009: 293）。正當台灣逐步邁入多元社會，在現實生活中傳播媒體的訊息多元豐富，反觀傳統教科書內容卻毫無生趣。在自由市場及資本主義的消費市場下，傳統教科書已無法符合需求（歐用生、楊慧文，1998: 26）。另一方面，由於《新著作權法》的實施，社會大眾普遍認為學子將無法享受廉價的教科書，卻也意外地再次奠定統编版教科書的合理合法地位（中央日報，1994. 01. 07）。大眾對於教科書的矛盾情結，油然而起。1994年，資深出版界人士吳澄飛投稿《中央日報》，擔憂地指出：「當泛政治化的影響範圍越來越廣時，層次影響越來越深時，安定數十年的國小教科書供應體系，縱然在外界壓力下，不得不開放，也該從嚴把關，分段實施、分科進行，以免動搖國民教育的基礎。」（吳澄飛，1994）。

開放中小學教科書成為本時期教育改革訴求重點之一，不過也引起多元的競爭。1988年開始實施國中藝能科教科書審定制，1996年及2002年國中小相繼全面實施開放審定制。1999年修訂公佈《教育基本法》，2000年公佈《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並於次年開始實施持續至今（林新發，2001: 86）。2004年，國立編譯館也退出教科書的編輯，僅扮演九年一貫課程的審訂機關角色。此時期歷經前一階段的鬆綁與改革，呈現一種多元互動的型態；在此共同基調下，各場域間亦呈現某些殊異的多元發展（陳文彥，2010: 140）。教科書的開放，不僅涉及官方知識的再定位，知識地盤的重整和利益的重新分配，更撼動了決定精英份子社會流動結果的考試制度，同時引來各方對教科書的爭議。有的指陳一綱多本造成書價高昂、不同版本導致年級之間教材銜接困難等問題。這些爭論也顯示不同政黨的選票之爭，課程決策之爭，以及意識形態之爭，課程改革亂象⁵成為舉世罕見的例子（歐用生，2006: 4）。儘管如此，黃馨儀（2005: 194）認為，目前各界所指陳的問題皆是教科書多元化可能產生的困擾，教科書開放自有其深遠的意義，是教育改革朝向自由開放發展的指標，更是課程多元彈性革新的具體實現。

周淑卿（2008: 32）建議可從知識觀點多元化、促進品質提升、教師專業自主三方面⁶來看教科書的多元化觀點。諷刺的是，學者們對教科書多元的觀點倒有一致的觀點。高

⁵ 對此亂象，歐用生（1996: 174）做了諸多評論：「教科書制度一直走在權力和利益爭奪的陰影下，這場教科書論戰雖然熾烈，但不精采，因為它只呈現資源的爭奪、政治的角力及權益的運作，完全缺少了專業的對話與哲理的辯論。」「一綱多本的批判論述氣勢十足，形成龐大的論述力量。顯現了教師課程意識的保守和傳統，也顯示課程改革永遠撼動不了教科書的聖經地位」（歐用生，2006: 15-17）。

⁶ 知識的多元化，即是不同的課程與教學理念，以及教材詮釋的觀點。品質的多元，實則包含形式與內容

麗珍在2009年第2期的《教科書研究》論壇中認為，教科書的多元，即是「趨同化異」。因為就外觀而言，各版本教科書的物理屬性相似度頗高，編排都具有圖文豐富化、活潑化、真實化的共同特性；各版本的單元架構及教材的組織方式，基本上似乎都保留了傳統分科、分單元模式；在知識詮釋的角度上，大抵偏向概念通則的灌輸。游自達也認為教科書「形式多元但實質趨同」，教科書開放所欲達成之「多元化」目標並未真正達成。目前的發展可說是「多個一元」，並非真正的多元⁷（論壇，2009: 123-129）。對此，時任國立編譯館館長的潘文忠特別強調：「中小學教科書應反映多元價值觀，不能只向富人看齊，未來在教科書編輯、審定委員、課綱委員等三方座談或檢討會時，【我】會提醒大家，不論制定課綱、編書或審書時，都應層層把關，強調多元價值觀。」（聯合報，2010, 10. 08）

此時期，台灣除了內部多元論述的發展外，又得兼顧全球化的影響。全球化蘊涵工業革命、科技革命、現代化、地球村、資訊時代等隱喻概念，這些概念在不同的時間透過全球與在地的交互影響而不斷改變及創新。隨著歷史遷移過程、經濟整合、科技發展及文化轉化，世界成為統一的場域。自然地，教育成為進入全球化世界的重要關鍵。全球化也意味著課程與教學的科技化，學生需要新的數位科技素養，有利於國際競爭；科技發展成為教科書的副產品，透過生產消費的資本模式，增強了「設計者」與「執行者」的控制關係（Brown, 2005: 171-180）。

數位教材、電子書、電子教科書等新科技，伺機取代傳統紙本式的教科書。根據美國出版協會公布的數據，2010年1月到8月，電子書的銷售額從2009年的8,980萬美元增加到2億6300萬，升幅為193%。由於這些數字不包括教科書和其他學術書籍，因此實際數字應該更大（彭淮棟，2010）。不少出版商因數位化而面臨經營危機。依據劉燕儷及邱重銘（2009: 258）的調查，1987年解嚴以來至2000年，出版社數量從將近3000家增為7000家，成長2倍之多。唯2001年出版業漸趨萎縮，從2002年的高峰至2006年，原本430.23億的產值快速滑落到250.7億。台灣陷於經濟不景氣循環，圖書閱讀市場停滯、閱讀風氣不佳，是主因之一，紙本的閱讀習慣轉變為電子閱讀，購買方式從實體書店轉為網路下單。國內兩家較大的教科書出版商（南一及康軒），也已朝向數位化發展，甚至成立數位研發部門（廖信、郝宗瑜、張簡碧萱，2010: 442）。

教科書面臨數位文化的挑戰，重新上演新舊文化的議題；所影響的不僅是教科書形

兩方面。各版本教科書在圖文編排形式、印刷裝訂方式上，能依其對教科書使用者的考慮而有所變化；內容品質也因各版本編者，而能有不同的教材選擇與組織。教師專業自主，即是不易受到意識型態的宰制，因此老師在教學時有很大的空間來作自由發揮（論壇，2009: 107）。

⁷ 此種現象可由下列兩方面看出：一是版本間的不同，只是內容取材或順序的局部差異，而不是教育理念或詮釋之別；二是目前各版本教科書之各年級教材架構與內容，相似性較高。

式的改變，而是整個教科書文化商品結構條件的改變。Hoctor（2005）曾以數位原住民（Digital native）及數位移民（Digital immigrants）區別伴隨科技成長的學童與成人之間的差異，提醒吾人必須為學童的未來—而不是我們的過去—作準備。在政府、出版業者及科技業者的強力影響下，教科書深受政治及商業利益影響，宣稱數位文化將徹底改變學習習慣，以提供學生未來更好的生活機會（Apple, 2003: 440）。白亦方（2000）分析了科技與課程的互動，為課程重新定義：「【數位科技】這樣的挑戰仍會持續的加廣加深，課程的傳統定義會受到科技的激盪，進而再概念化。」說明了教科書與數位文化間，應有正向的互動。因此，此時期的教科書（或出版業者）必須思考如何在商業利益及社會責任之間維持平衡，擔任國家象徵文化的先鋒（Apple, 1998: 161）。

回顧台灣教科書的發展，是一段漫長而迂迴之路（國立編譯館中小學教科用書編輯研究小組, 1988: 46）。教科書的發展歷程，展現了我國百年以來不同文化的選擇及其互動過程中的涵納（included）、排除（excluded）、甚至扭曲（distorted）某（些）特定類型知識的滄桑。清末教科書在西方文化的觸動中自行摸索，體現追求新知的渴望；民初教科書在新文化的激盪中力圖改變，體現科學與民主的新思維；抗戰時期教科書在殖民文化的強行置入中屈身求存，承擔民族存亡的責任；政府遷台後的教科書，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再現中尋求復興契機，體現威權政治的意識形態；解嚴後的教科書，於在地文化的覺醒中引發認同危機，見證台灣主體的平衡需求；至今台灣教科書進入多元文化社會競爭中，取得新角色的地位，體現文化傳遞的多元管道。教科書在不同時代提供了可貴的借鏡，也彰顯我國百年的歷史刻痕。

參、教科書的歷史借鏡

Bellack（1969: 284）曾提醒吾人，歷史能讓我們知道課程變革的可能性及複雜性，並探究過去到現在情境所遺存的產物，以及對未來的渴望。台灣的課程改革，多半企圖解決課程內容問題，忽略了遺留下來的產物—教科書。透過教科書歷史的敘說，我們可以瞭解教科書的歷史意義、功能及角色，但是教科書的演進歷程能帶給我們什麼樣的借鏡？為何教科書制度會如鐘擺般來回移動？為何教科書常因外來文化而意外地鞏固地位？為何社會大眾長期依賴教科書，但卻不信任教科書？諸如此類的問題，不只是政策制定者或改革者，甚至課程專家面對一再發生的問題，仍然束手無策，陷入Kliebard（1968: 69）所說的窘境：「課程專家似乎無能地對其專業領域提出看法，他們的爭論充滿不斷的哀嚎與說辭。」雖然教科書本應平實、質樸，不過，不同時代展現的教育風格、思維及論述，足以影響後人的思想言行與作為。因此，教科書的歷史刻痕，可為未來發展帶來些許借鏡。

一、每一時期教科書都有其特質，在適當的時空下可推行順利，但時過境遷，卻又窒礙難行。

教科書的發展有其社會條件。最初教科書的發展，本質上是對新教育的茫然無知，而政府任其自由發展，無意間促進了教科書事業的蓬勃發展。當統治者意識到新式教科書對傳統文化有所扞格而產生矛盾情結時，審定制或統編制逐漸盛行；此說明了統編及自編教科書在歷史上各有其意義。在當時審訂制度下，民間版教科書難有較大的突破。不過，至今社會大眾認為開放教科書，民間版教科書市場才能興盛，實際上其仍然面臨品質與市場生存的壓力。又如，大眾所期望社會「國民」之培育，歷經新文化、殖民文化、儒家文化及在地文化的情境氛圍，國民本質的內涵，從完全的人格（重視自由民主）、忠良國民⁸（重視身心發展）、健全的國民（重視忠勇愛國）進展到現代國民（重視基本能力）。驗證了教科書在所有脈絡時空中，始終都沒有一致無誤的最高價值，每一種教條皆有其訴求者及擁護者。這也說明了，在某個場域中獲得高度肯定的事物，未必在另一個場域中具有同等意義（Kliebard, 2002: 76）。對此，有識者並不感到意外；教科書與社會情境間的交互影響，顯示了教科書其實比任何改革者的預期，更具有想像空間。

二、吾人長期關注教科書的內容、形式，勝於興趣、學習的價值。

歷年來教科書的發展，從物質層面轉移到制度層面，再從內容層面轉移到體例形式層面，反映的只是技術性問題，於是折衷眾議、去蕪存菁成為最佳的解決方式（紀海泉，1975: 1）。這種現象值得省思。教科書內容攸關學校教育的目的。雖然教什麼的確是個難題，但教科書不應只是事實的累積，或是專家、政治人物的觀點，而應該是能協助學生獲得洞察經驗的透鏡（Boostrom, 2001: 231）。因此，教科書的學習興趣及價值也很重要；就教育面來看，興趣意謂著學生喜歡閱讀，進行有意義的發現；就商業面來看，興趣也意謂著賣點，教師能被吸引使用，學生能享受閱讀的樂趣。教科書應承擔一種有效學習工具的角色，教師的責任即在思考如何透過書本擄獲學童。我國教科書的歷次修訂，不斷直接、間接地透露，國家、社會或個人需要某種知識，但卻無法明確保證能夠兼顧學童的興趣，或思索到行的教科書是否有用。著重內容的去蕪存菁、探討新舊版本的差異與意識形態的爭論、或編撰體例異同等技術思維，未曾稍歇。然而，教科書不只是學術議題，也不只是社會議題，它攸關如何為學童安排完善的學習機會（孫邦正，1959: 1）。

⁸ 日本統治時期，台灣開始現代化的教育。1919年，由總督府公布實施「台灣教育令」，在總則中提到：「以育成忠良國民為本義」，總督府並以此作為掌控課程規劃的原則（莊萬壽，2003: 33）。

三、教科書的殖民印象，反映出長期象徵資本的累積。

在教科書發展歷程中，抄襲、模仿、殖民、虛構等作為，已成為普遍現象。最初西方文化的刺激，點燃教科書發展之熱潮，但為了兼顧傳統封建體系，不得已借鑑傳統教材，力圖從中發揮出些許新意，以適應新時代的需求，並維持舊力量的抗衡。這種舊瓶裝新酒的做法，固然是當時人們從既有歷史繼承中，對於時代創新的一種嘗試；但由於經驗不足，以致出現模仿的現象，企圖達到傳遞新文化的目的。隨著政治層面的操弄，教科書漸漸成為統治者依其文化、價值、信念及理念，所虛構出的故事文本，企圖建立統治的階級架構，維持現有的權力。至今，教科書因為商業利益考量，在內容上相互臨摹，以顧及整體市場需求，形成了形式多元、實質趨同的新瓶裝舊酒現象。這些殖民現象成為一種教科書歷史的表現，學生在課堂中與教科書互動之際，不斷地重複這些敘事（Chappell, 2010: 249），驗證了從古至今教科書除了重視獲利之外，更重視長期象徵資本的累積（Apple, 1998: 161）。教科書成為象徵某種課程意義的具體教材，透過儀式（頒布課程標準或綱要）、尊崇（學者或諸多利益團體背書）及多元功能（滿足國家、社會及個人需求），製造出更多不易察覺的煙幕（Sirotnik, 1998: 66）。

四、教科書的掌控及鬆綁，是長期的教育競技場域。

早期的教科書並無明確一致的管制措施，時而開放、時而審定或統編，甚至審定與統編並行。遷台後，配合九年國教之實施，國立編譯館掌管了教科書的撰寫及出版，開始了長達二十多年的全面統編本時代。至今，教科書市場開放自由競爭，意圖增進教科書品質已成趨勢，但官方與民間書商是否仍舊擁有教科書內容最終版本的論述權，難有定論（Su, 2006: 233）。自由市場經濟思維促生下的種種審定版教科書，仍然無法為型塑更多完美國定課程的理想，帶來十足把握。學校仰賴教科書出版業提供的資訊做為選用依據，但是那些資訊不等同於改革的良方（Boostrom, 2001: 9）。由此，教科書的掌控及鬆綁，乃是社會不同價值⁹的爭論（王麗雲、甄曉蘭，2009: 17）。從教科書的發展歷程來看，教科書經由學制（新學堂、義務教育）、課程（標準、綱要）及考試制度（科舉、聯考），形塑其崇高地位。尤其在政府頒訂的國定課程標準下，它是升學考試、傳統知識的依據，自然屬於一種封閉的課程系統（歐用生，2008: 6）。教科書獲得如國定課程般的權威地位（Watt, 2007: 9），也等同社會有效知識的權威版本（Olson, 1989: 239），其地位屹立不搖。由此可以看出長期依賴教科書，卻又對教科書不曾信任的矛盾

⁹ 王麗雲及甄曉蘭（2009: 16-17）以選擇、效率、均等、品質與卓越核心價值來看教科書。選擇價值偏向自由；均等價值強調教科書降低對不利學童的影響；品質或卓越價值則重視經典與學術導向。這些價值同時存在，而且在某些社會情況下，特定價值會大行其道。

情結，根深蒂固地深植社會大眾心中。教科書發展的掌控與鬆綁仍然在游移生成之中，成為長期的教育競技場域。

肆、結論

教科書的演進，絕不僅僅是學科知識的去蕪存菁或體例編排問題，而是其做為一種文化承載的選擇，深切影響著整體的社會變革。我國教科書蘊含的文化變遷，展現了新舊力量的較量，而這種緊張關係影響了教科書的演進。新文化運動的興起，賦予教科書新的生機，期間有關教科書的思想觀點、對白話文教科書所持的態度，新舊力量依舊各不相讓。然而教科書意外地因外來文化的侵略，塑造出特有的地位；在新舊力量不斷抗衡中，造成內部認同的矛盾。多元文化論述似乎成為教科書發展的共通趨勢，唯其過程仍是模糊不清，此因新舊力量仍無一致的看法。由此可見，教科書的演進歷程，主要繫於社會結構的變化和社會發展的需要，也關係到不同文化力量在政治上較量的結果。本文研究的價值，就社會意義而言，在於期使社會大眾瞭解每一文化背景下的社會規範，修正其對教科書的刻板印象；就教育意義而言，則暨望提供文化傳統、創新選擇的借鏡，實現教育目標所應完成的基本任務；就學術意義而言，期待有志者能夠洞察教科書歷史的重要線索，共同形塑政治社會與教育專業的論述空間。

參考文獻

- 中央日報（1935, 06. 06）。徵求小學教科書評論。
- 中央日報（1938, 06. 30）。改編教科書適合抗戰需要。
- 中央日報（1946, 04. 01）。教科書不應獨佔。
- 中央日報（1947, 10. 08）。編譯館鼓勵檢舉敵本教科書。
- 中央日報（1969, 01. 21）。北市書商成立教科書出版協會。
- 中央日報（1994, 01. 07）。新著作權旋風吹亂了文化界的心。
- 毛帥（2008）。試論1905-1919年間中國從政治到文化變革轉向中的激進趨勢。《中華人文社會學報》，9，118-140。
- 王甫昌（2001）。民族想像、族群意識與歷史——《認識臺灣》教科書爭議風波的內容與脈絡分析。《臺灣史研究》，8（2），145-208。
- 王建軍（1996）。中國近代教科書發展研究。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
- 王恩美（2010）。冷戰時期學校教育中的反共形象：以台灣與韓國兩地小學教科書為中心的分析。《思與言》，48（2），49-117。
- 王麗雲、甄曉蘭（2009）。社會學取向的教科書政策分析。《教科書研究》，2（1），1-28。
- 司琦（2005）。小學教科書發展史（下）：小學教科書紙上博物館。台北：華泰文化。
- 台灣日報（1995, 02.14）。落實教育改革、重視文化整建。
- 台灣教育會（1995）。台灣教育沿革誌。台北：南天。
- 白亦方（2000）。科技與課程的互動分析。論文發表於「新世紀的前瞻與展望——師資培育與課程改革研討會」，台北：台北教育大學，2000年12月1-2日。
- 石玉、葛越（2010）。再現與重構：從教科書看教育史研究的新路徑。《湖南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報》，9（2），127-129。
- 石鷗（2007）。最不該忽視的研究——關於教科書研究的幾點。《湖南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報》，6（5），5-9。
- 石鷗（2009）。百年中國教科書圖說1897-1949、1949-2009。湖南：湖南教育。
- 石鷗、張斯妮（2009）。蔡元培與中國現代教科書的發展。《湖南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報》，8（2），5-9。
- 羊憶蓉（1994）。教育與國家發展——台灣經驗。台北：桂冠。
- 何力友（2006）。戰後初期臺灣國民學校教科書初探——以國家圖書館編《臺灣光復初期出版品書目（1945-1949）》為例。《國家圖書館館訊》，95（4），16-21。
- 吳小鷗（2007）。浸潤與激盪——清末民國教科書對社會變革之影響。《湖南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報》，6（5），19-24。
- 吳小鷗、周英杰（2010）。琅琅書聲中的百年記憶——寫在《百年中國教科書圖說》出版之際。《湖南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報》，9（2），124-126。
- 吳文星（1982）。日據時期台灣師範教育之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
- 吳研因（1936, 01. 30）。清末以來我國小學教科書概觀。中央日報。
- 吳密察、江文瑜（1994）。體檢國小教科書。台北：前衛出版。
- 吳澄飛（1994, 11.01）。開放教科書供應制所附的社會成本。中央日報。
- 周其厚、荊世杰（2007）。論民國中華書局教科書之特點。《廣西師範大學學報》，43（3），106-112。
- 周珮儀（2003）。我國教科書研究的現況分析與趨勢展望。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編號：NSC92-2413-H-110-002），未出版。

- 周珮儀、鄭明長（2008）。教科書研究方法論之探究。《課程與教學季刊》，11（1），193-222。
- 周婉窈（1999）。實學教育、鄉土愛與國家認同——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第三期「國語」教科書的分析。《臺灣史研究》，4（2），7-49。
- 周淑卿（2008）。豈是「一本」能了？——教科書概念的重建。《教科書研究》，1（1），29-47。
- 周陽山（1990）。自由與權威。台北：三民書局。
- 紀海泉（1975）。小學課程研究。台北：正中書局。
- 范軍（2010）。20世紀30年代商務版大學叢書的策劃與運作。《濟南大學學報》，20（4），7-13。
- 林新發（2001）。跨世紀台灣小學教育改革動向：背景、理念與評析。《國立台北師範學院學報》，14，75-108。
- 孫邦正（1959）。小學課程編制。台北：中華書局。
- 國立編譯館中小學教科用書編輯研究小組（1988）。中小學教科用書編輯制度研究。台北：國立編譯館。
- 莊萬壽、林淑慧（2003）。本土化的教育改革。《國家政策季刊》，2（3），27-62。
- 郭太風（2004）。日本的文化侵略與中國出版業的命運——以商務印書館為例。《史林》，6，30-37。
- 陳文彥（2010）。學校權力結構鉅觀制度變遷之研究。《屏東教育大學學報》，35，125-154。
- 陳希林（1997, 07.05）。「認識台灣」八學者再喊且慢。《聯合晚報》。
- 陳虹文（2001）。日本殖民統治下台灣教育政策之分析研究——以公學校國語教科書內容分析為例。國立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高雄。
- 彭淮棟（2010, 10.16）。電子書年度銷售量勁升193%。《聯合報》。
- 彭雪玉（2006）。國民黨政府勞動控制體制之探討：1949-1987年間歷史與結構的因素。《思與言》，44（3），179-230。
- 華苑（2006）。從蒙學教科書到最新教科書。《山西師大學報》，33（2），94-98。
- 賀金林（2006）。國民政府時期中小學教科書供應體制的沿革。《中山大學學報》，46，44-48。
- 黃俊傑（2006）。戰後臺灣的轉型及其展望。台北：台灣大學。
- 黃英哲（2006）。戰後初期台灣知台灣研究的展開：一個歷史斷裂中的延續。《台灣文學研究集刊》，2，105-128。
- 黃馨儀（2005）。我國教科書開放政策之評析。《學校行政》，40，190-200。
- 楊蕙菁、廖敏如（1997, 10.26）。認識台灣教材：學者指陷意識型態困境。《聯合報》。
- 廖信、郝宗瑜、張簡碧萱（2010）。國小教科書數位化出版之探討——以康軒出版社為例。《中華印刷科技年報》，2010，439-449。
- 趙永茂（1996）。台灣地方派系的發展與政治民主化的關係。《政治科學論叢》，7，39-56。
- 劉性仁（2008）。從明鄭到2000年民進黨執政之時間點來探討影響臺灣島內族群意識差異的歷史事件。《臺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刊》，7，39-61。
- 劉燕儷, & 邱重銘（2009）。試論2001~2007年間台灣圖書出版產業的變化——以景氣為中心的探討。論文發表於「2009年嘉南藥理科技大學文化事業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南：嘉南藥理科技大學，2009年5月21日。
- 歐用生（1996）。新世紀的課程改革。台北市：五南。
- 歐用生（2006）。臺灣教科書政策的批判論述分析。《當代教育研究》，14（2），1-26。
- 歐用生（2008）。「一綱一本教科書事件」評議。《教科書研究》，1（1），1-28。
- 歐用生、楊慧文（1998）。新世紀的課程改革——兩岸觀點。台北：五南。
- 蔣廣學（2010）。商務印書館早期教科書的歷史意義。《編輯學刊》，2010（1），86-88。
- 蔡盛琦（2009）。台灣流行閱讀的上海連環圖畫。《國家圖書館館刊》，98（1），55-92。
- 論壇（2009）。審定制教科書內容多元化及品質議題。《教科書研究》，2（1），107-163。
- 聯合晚報（1997, 07.13）。認識台灣那麼難？

- 聯合報 (1955, 04.04)。教科書收費問題教育財政當局傷透腦筋。
- 聯合報 (1955, 09. 20)。教科書年年變樣：家長們歲歲掏錢其實是換湯不換藥，翻版算變成新的。
- 聯合報 (2010, 10. 08)。國立編譯館：會強調多元價值觀。
- 謝毓洁 (2010)。晚清新是教科書的近代化歷程。史料，6，105-109。
- 魏玫娟 (2009)。多元文化主義在台灣-其論述起源、內容演變與對台灣民主政治的影響之初探。台灣社會研究季刊，75，287-319。
- 賴美鈴 (2000)。日治時期台灣音樂教科書研究。台北：財團法人交流協會。
- Apple, M. W. (1986). *Teachers and texts: A political economy of class and gender relations in educ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 Apple, M. W. (1998). The culture and commerce of the textbook. In L. E. Beyer & Michael W. Apple (Eds.), *The curriculum: Problems, politics, and possibilities* (pp. 157-176).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Apple, M. W. (1998). Teaching and technology: The hidden effects of computers on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L. E. Beyer & Michael W. Apple (Eds.), *The curriculum: Problems, politics, and possibilities*.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Apple, M. W. (2003). Is the new technology part of solution or part of the problem in education? In A. Darder, M. Baltodano & R. D. Torres (Eds.), *The critical pedagogy reader*(pp. 440-458). New York: Routledge Falmer.
- Bellack, A. A. (1969). History of curriculum thought and practice. *Review of Education Research*, 39(3), 283-292.
- Boostrom, R. (2001). Whither textbooks? *Journal of Curriculum Studies*, 33(2), 229-245.
- Brown, L. (2005). Virtual spaces for innovative pedagogical actions: Education, technology, and globalization. In M. W. Apple, J. Kenway & S. M. (Eds.), *Globalizing education: Policies, pedagogies, & politics* (pp. 171-189). New York: Peter Lang.
- Chappell, D. (2010). Training Americans: Ideology, performance, and social studies textbooks. *Theory and Research in Social Education*, 38(2), 248-269.
- Crawford, K. (2003). The role and purpose of textbook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istorical Learning, Teaching and Research*, 3(2), 5-119.
- Hocor, M. (2005). Accessing information: The Internet – a highway or a maze? *Gift Child Today*, 28(3), 32-37.
- Issitt, J. (2004). Reflections on the study of textbooks. *History of Education*, 33(6), 683-696.
- Jean, A. (1978). Elementary social studies textbooks and legitimating knowledge. *Theory and Research in Social Education* 6(3), 40-55.
- Kliebard, H. M. (1968). *The struggle of American curriculum*. Goston: Routledge & Kegan.
- Kliebard, H. M. (1998). The effort to reconstruct the modern American curriculum. In L. E. Beyer & Michael W. Apple (Eds.), *The curriculum: Problems, politics, and possibilities* (pp. 157-176).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Kliebard, H. M. (2002). *Changing course: American curriculum reform in the 20th century*.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Express.
- Komoski, P. K. (1985). Instructional materials will not improve until we change the system. *Educational Leadership*, 42(7), 31.
- Olson, D. R. (1989). On the language and authority of textbook. In A. L. S. de Castell & C. Luke (Eds.), *Language, authority and criticism: Reading on the school textbook* (pp. 233-244). Philadelphia: Falmer Press.
- Rossmiller, R. A. (1992). Textbooks: What's at stake? *Focus in Change*, 6, 2-18.

- Sirotnik, K. A. (1998). What goes on in classrooms? Is this the way we want it?. In L. E. Beyer & Michael W.Apple (Eds.), *The Curriculum: Problems, Politics, and Possibilities* (pp. 58-72).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Su, Y. C. (2006). Political ideology and social studies curricula in Taiwan. *Asia-Pacific 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 34(3), 353-364.
- Watt, M. G. (2007). Research on the textbook publishing industry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Research on Textbooks and Educational media*, 1(1), 1-17.